

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鈺 · 朱維鈺 廖梅 編校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新學偽經考/(清)康有為著.-北京: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, 1998.6

(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/錢鍾書主編)

ISBN 7-108-01152-2

I.新… II.康… III.①經學-研究②康有為-著作 IV. 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98) 第 16012 號

新學偽經考	著者 康有為 責任編輯 潘振平 封面設計 寧成春 版式設計 陸智昌	出版發行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 (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) 郵 編 一〇〇〇一〇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	版 次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開 本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數 六三五×九六〇毫米十六開 字 數 三千冊 定 價 三十四萬二千字 印張三十三·六二五 四十八元
-------	--	---	--

編者說明

《中國近代學術名著》的晚清編，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，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。

選選的學者和論著，着眼於學說有新意，有己見，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，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。

結集則不拘一格，以專題為主，每種或收一人一書，或輯一人多篇，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。

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：選擇底本，取原校較精的刊本；異本互勘，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；覆核引文，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；重施標點，包括分段；編製索引，分人名、書名兩類。

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，附於篇前。導言既重可讀性，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；也重學術性，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。為行文簡明，諸導言凡引證出處、攷訂史實或商榷

疑義，均以附注形式陳述。

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，晚清編擬分輯刊行，初定每輯十種，先成先印。如可按設想出齊，當能略見系統性。

這套選編，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，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。編輯設想、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，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，交由執行主編朱維幹組織實施。

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，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。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，由於種種緣故，長期不克面世。現由北京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。

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，同時期待高明指正。

編例

一、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，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：

底本。以原刊為主，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。

校勘。正底本排校外誤；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，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。一般不作理校。

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，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，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。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；於正文不作改動。

節錄。於篇題下注明：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。

標點。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，概施以新式標點。

分段。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，以便讀者。

注釋。作者原注概從原刊。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譌誤，以頂注出之。

譯名。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。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譌誤，則由編者逕予改正。為方便閱讀，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。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。

版式。概用繁體字，直排式。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，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，均改為通行繁體字。原作或有雙行夾注，現均改為單行夾注。

索引。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、書名兩種索引，以便通檢。

二、本叢書所選諸種，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，予以保留，並移作附錄。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導言

朱維鈞

壹

康有爲是晚清民主運動的名角。從一八八八年他以平民身份首次給清朝皇帝上萬言書，到一九〇二年他在海外發表反對中國實行革命的公開信，那十四年間，他一直被盟友和政敵當作提倡改革的領袖。

確實的，在那個世紀交替之際，中國的民主運動，雖然人材輩出，未來的革命家們也已紛紛登台亮相，却還沒有人能同康有爲抗衡。他不僅發動過「公車上書」，主持過「百日維新」，策劃過自立軍起事，而且在從事實際活動的同時，留下了堪稱等身的著作。人們可以說，沒有梁啟超，沒有譚嗣同，沒有唐才常，沒有黃遵憲、汪康年等等大羣志士仁人，康有爲也許一件事都做不成。但人們很難否認，正是康有爲，集中了從龔自珍、馮桂芬以來，綿延了半個多世紀的改革要求和理論，構成了一個體系。這個體系，在理論上也許很荒謬，經不起邏輯和歷史相結合的驗證，却是那個時代的實際運動能夠接受的一種思想範式。

康有爲構成的這個駁雜體系，包涵着對中世紀學說的否定，對消逝已久的古典傳統的梦想，

對未來世界的烏託邦式設計。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，那就是一八九一年發表的《新學偽經考》，一八九八年一月出版的《孔子改制考》，一九〇二年完成的《大同書》。

貳

關於康有為這個人，從一八九九年梁啟超發表《康南海傳》以後，百年來有關他的傳記或年表，長長短短的已有許多〔二〕。其中不乏粉飾、溢美、辯解乃至神化之辭，還有種種待解的疑團，但如稍加整合，大體可知。

當一八五八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出生的時候，清帝國正面臨存亡關頭。太平天國雖已內闕，旗幟未倒，而英法聯軍佔領了廣州，還在向天津推進。咸豐皇帝在兩年後便帶着他的后妃大臣倉皇逃出北京。然而南海康氏家族似乎沒受影響。康有為的祖父輩反而乘亂世發了家，好幾人因參與內戰有功而做了官。於是湘軍首領曾國藩、駱秉章、左宗棠等，也就成了少年康有為最早崇拜的聖賢。

隨着太平天國的失敗，北方的捻軍、南方的天地會也相繼被清軍消滅。帝國又暫時穩定了。但康有為的父親在這時死去，他於是前往連州跟隨擔任州學訓導的祖父讀書。十一歲的康有為首次接觸了邸報，開始對時政發生興趣。兩年後又跟隨祖父到了廣州，初見世面。十四歲回鄉，又大讀叔祖父的藏書，方知經史以外別有學問。雖因八股文蹩腳，不能博得一襲青衿，而備受家族

責難，被迫埋首揣摩制藝，但仍然好觀雜書。十七歲見到徐繼畲的《瀛環志略》和世界地圖，引起了解域外情形的慾望。

有關康有爲的傳記材料，都沒有道及他何時成了生員。好在康家有財有勢，納粟入監並不困難。不知是否由此途徑，十九歲的康有爲首次參加鄉試，但被黜落。也不知是否祖父對他失望的緣故，就在同年他被送到著名學者朱次琦門下，研習以理學爲主的經史小學著作，前後三年。看來他對考據同樣不感興趣，因爲他追求的目標是成爲當代聖人。一八七七年他二十歲，連州一場洪水淹死了他的祖父。他成了一家之長，於是在次年作出了退學決定。告別了朱次琦，跑回家鄉人山面壁，沉思佛老的哲理。

正在他彷徨中，結識了回鄉休假的翰林院編修張鼎華，「盡知京朝風氣、近時人材及各種新書」，令他茅塞頓開^二。於是出山去逛香港。正如當年魏源僅作香港一日遊，便對這個英國殖民地的秩序欽佩不已那樣，康有爲在一八七九年初遊香港，也對「西人治國有法度」^三感到吃驚。從此他裁量中土是非，便換成了西方的，更其是英國的尺度。

一八八二年，康有爲二十五歲，首次出廣東，進北京，參加順天鄉試。結果還是落榜。他在沮喪中南返，途經古稱繁華的揚州、南京遊覽。可能有香港作對比，他在揚州觸目所感的是頹敗氣象。然而到了上海租界，却使他興奮，以爲這才是他的理想所在。在上海，他大買西書，回鄉後便潛心研究，尤其留意西方的政治制度。次年他便在家中開改革，立了個不裹足會，運用家長權威，首先禁止女兒和姪女纏足。

香港和上海的經驗，使康有爲如此迷戀，以致他逐漸萌生了一個古怪念頭，就是在中國學西方不成的話，他便赴南美洲去開拓殖民地，實現他的理想秩序。這念頭固然荒誕，却正好表明他嚮往的不是「復古」，而是「西化」，即資本主義化。迴避這個事實，便不可能理解那時的康有爲。

然而現實却不是中國人能否去海外建立殖民地，而是中國本土會不會淪爲殖民地。中法戰爭再次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。到一八八四年，戰爭已經斷續打了十年，法軍敗多勝少。然而清政府却屈服於法國的恫嚇，在次年撤回了堅持主權的邊界談判代表鄧承修，另派李鴻章談判「和議」。同年翰林院編修梁鼎芬，又因彈劾李鴻章賣國而被罷官。鄧、梁都是康有爲的同鄉友人。這使康有爲更感到切膚之痛。「山河尺寸堪傷痛，鱗介冠裳知少多？」^{〔四〕}「布衣老大傷懷抱，憂國無端嘆有聲」。^{〔五〕}可能正是從一八八五年起，他便醞釀直接給皇帝上書。

經過三年猶豫，一八八八年康有爲終於決定乘再次人都應試的機會，直接上書光緒皇帝，陳述時危，請求變法。不想碰了個大釘子，沒有一名大臣敢給他轉呈給皇帝不說，還被京中大小官僚非議指斥，因爲他居然不顧清朝近二百五十年的先例，指望至尊接納一名布衣的萬言書，況且公然要求變革祖宗成法。他的那些同鄉京官甚至準備開會公議，將他逐出北京。這使康有爲既憤且畏，只得聽從沈曾植、黃紹基等異鄉友人的勸告，「勿談國事」^{〔六〕}，去搜集金石碑刻，登臨萬里長城。

但康有爲不是那種輕易認輸的人。正像中外歷史上那些向傳統挑戰的人物一樣，康有爲也是

自信得好像目空一切，頑強得好像執拗不堪，而且領袖慾膨脹到自我感覺「安石不出，如蒼生何」的地步。〔七〕他上書失敗，固然深感沮喪，但認定原因在於滿朝文武都不是東西，「不獨不能變法，即舊政風紀，亦敗壞掃地」〔八〕。

這樣的人物，很難避免自我迷信。康有為不是早以當世聖人自居嗎？孟軻不是說過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嗎？緯書上不是記有孔子「端門受命」的故事嗎？所謂無巧不成書罷，剛在上書失敗後，康有為得知天壇祈年殿被雷擊引起的大火燒燬。迷信的西太后慌了，趕緊表白從明年起還政光緒。同樣迷信的康有為却樂了，他立即推算，祈年殿建成至今「五百年矣」〔九〕。不待說，年輕的光緒皇帝將是受命改制的聖君，而他康有為也被上天承認是「為漢制法」的今聖。

剩下的問題，就是像孔子那樣作《春秋》了。可惜康有為一則尚未收徒講學，二則尚未寫出足同《春秋》媲美的巨著。

叁

「已淨萬緣隨念盡，更無一法與人言」。〔一〇〕一八九〇年初康有為回廣州後寫下的這兩句詩，是喪氣話，也是老實話。

例證可看他在這時改了又棄置的《教學通議》〔一一〕。這部顯示康有為早期思想矛盾的佚著，旨在論證社會改革應從教育改革入手。叙說劈頭便稱中國所以弱，在於朝野上下均無人才。那是

逐點抄錄七十年前龔自珍已說過的話。〔一二〕叙說又稱中國言教通治的出路，在於「師古」，而關鍵在於師古要「得其精意」。那又是龔自珍最佩服的王安石《上仁宗皇帝書》所謂法先王之政「當法其意」的回聲。〔一三〕古聖前修設學立教的精意何在？在《四書》中，更在《周禮》中。書中已在抨擊劉歆，說是治經先要辨別今古之學。「古學者，周公之制；今學者孔子改制之作也。」〔一四〕但那非但是廖平在一八八六年發表的《今古學考》的見解，而且同全書糅糅今古、不別漢宋的多篇內容極不相稱。〔一五〕

可見，這時的康有為，已在構造他的體系，却正在難產中。因為他對中世紀經學的淺薄識見，使他沒有能力進而打破後壁，正需有棒喝者相助，否則無「法」傳人。

棒喝者已先到廣州了。他就是廖平。這位四川井研人，是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所提攜的門生，王闓運任成都尊經書院山長所賞識的弟子。他從考據學入手，轉而跟隨王闓運研究經今文學，已逾十年。作為學者，他好新而膽小，因而在學術上，勇於自我否定，而怯於堅持己見。這使他一生論學總在變，總見解變了六回。一八八六年《今古學考》刊行後，受到批評和讚揚。張之洞不喜歡，而經學大師俞樾則深表讚賞。也許由於中舉人成進士給了他勇氣，他決定棄舊說而創新論，否定《今古學考》「平分今古」的看法，進而「尊今抑古」，作《知聖篇》、《闢劉篇》。後者說《周禮》等古文經傳多係劉歆偽造，前者說西漢今文經傳才是孔子改制的創作。但一八八九年他應張之洞邀赴粵途中，在蘇州謁見俞樾，略露改變見解的意向，便使俞樾「不以爲然」，抵廣州後又因《今古學考》而受張之洞申飭〔一六〕。這使他不敢將兩篇付梓。

康有爲在一八八八年已從友人處借閱《今古學考》。待回廣州，即主動去拜訪廖平。首次晤談似不順利。據廖平說，當時他將《知聖篇》手稿給了康有爲。康有爲回去讀後給了他一封近萬字的長函，「斥爲好名驚外，輕變前說，急當焚燬」〔二七〕。此信已不存，但看過後來康有爲與朱一新辯論《新學僞經考》得失的那些書信的，都不會否認廖平所述屬實。廖平覆函約期再談，這回「兩心相協，談論移晷」〔二八〕。他有没有將《關劉篇》手稿交給康有爲，還不清楚〔一九〕。但廖平以下所言非虛：「明年，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，而《新學僞經考》成矣」〔二〇〕。

康有爲的《新學僞經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，究竟是否剽竊廖平的《關劉》《知聖》二篇，無疑是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。孰是孰非，史學家們聚訟紛呶，或許將繼續到下一世紀。歷史是最大的審判官，我們用不着替歷史作出仲裁。但梁啟超的證詞值得重視。他一再說，康有爲著成《教學通議》後，「見廖平所著書，乃盡棄其舊說」〔二一〕假如沒有更原始的材料予以否證，那麼廖平至少充當了康有爲理論體系的助產士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肆

康有爲在一八九一年頗爲風光。去歲六月，著名的學海堂高材生陳千秋前來拜門。八月陳千秋又引進梁啟超來稱弟子。梁啟超十七歲中舉，以舉人拜諸生爲師，其效可知。於是優秀青年接踵而來。康有爲大得意，決定正式辦學堂。校址選在廣州長興里，自任總教授總監督，命陳千秋

任學長。寫詩道：「聖統已爲劉秀篡，政家並受李斯殃。大同道隱禮經在，未濟占成易說亡。良史無如兩司馬，傳經只有一公羊。羣龍無首誰知吉，自在乾元大道長。」〔三二〕

此詩表明，康有爲已從上書不達的打擊中緩過氣來，而且得意忘形了。誰都知道「羣龍無首」的原始宗教涵義。那時留下的《長興學記》，是陳千秋整理過的乃師授課筆記。其中《周禮》不見了，唯有對劉歆「偽經」的攻擊留存。這是誰的論調？不言而喻。長興里學堂開學不到半年，《新學偽經考》便問世。全書十四篇，廿餘萬字，取材立論與《教學通議》大相逕庭。廖平形容它成書之速，「倚馬成書，真絕倫矣」〔三三〕。略知做學問是怎麼回事的，大概都很難同情康有爲。

梁啟超曾說，《新學偽經考》的成書，他和陳千秋「多所參與」〔三四〕。從目前《新學偽經考》的再版本來看，雖然敘說刪去了梁啟超「贊助編檢」的事蹟，但「偽經傳授表」上下和「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」，都是梁啟超代作，而《書序辨偽》出於陳千秋之手，則是康有爲未能掩飾的事實。而在全書中勉強可說非蹈襲前人的另外二篇，《經典釋文糾謬》和《隋書經籍志糾謬》，從其內容與梁、陳代撰三篇的關聯來看，也很難說是康有爲自作。

假如康有爲的經學歷史造詣能同他的政治野心相稱，那麼我們覆按他引用的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的史制，也許可以承認他還有些學問，從朱次琦三年至少通讀過《史記》、兩《漢書》等。不幸，我們覆按《新學偽經考》那些浩繁引證的結果，發現它們不是襲自襲自珍、魏源、廖平，便是襲自劉逢祿、陳壽祺、陳喬樞、顧樸三、侯康等的著作。本書編者不擬逐一指出康有爲的引

證來由，但部分校記，可證明我們所言非虛。【二五】

不過，就思想史論思想史，那麼我們仍可承認，康有為儘管並非卓越的學者，《新學偽經考》儘管缺乏學術的意義，却仍然具有歷史的意義。

伍

《新學偽經考》的邏輯很簡單。康有為首先設定：清朝尊信的儒家經籍，大部分不是孔子的本經，而是劉歆為幫助王莽篡漢編造的「偽經」；清儒服膺的漢學，也根本不是孔子的真傳，而是劉歆替新莽統治尋找合法依據，變亂孔子之道的「新學」。【二六】

既然如此，那麼從公元以後歷代王朝尊奉的聖經賢傳，有幾種不屬於「新學偽經」？又有幾種不應該予以否定？倒霉的還有鄭玄。他被康有為判決是劉歆的最大幫兇，「布行偽經，纂孔統者」【二七】。

「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暖，聚百千萬億衿纓之間學，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，咸奉偽經為聖法，誦讀尊信，奉持施行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。亦無一人聽違者，亦無一人敢疑者。於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，而抑孔子為傳。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，而目為斷爛朝報。六經顛倒，亂於非種；聖制埋瘞，淪於茅霧；天地反常，日月變色。」【二八】

昔日韓愈否定漢唐舊經學，說是從孟軻死後，「道統」便中斷，中國人在黑暗中生活了千餘

年。如今康有爲又將這個下限拉長千年。令人一看便知，他在控訴他的時代依然天昏地暗。

於是康有爲便以掃除陰霾爲己任。他曾指斥乾、嘉以來的漢學，專尚考據，「瑣碎而破道」。但在《新學偽經考》的寫法上，他却採用了「考證」的形式。全書十四篇，篇目即所「考」主題，編次大致按照歷史順序。篇目下先加釋題按語，隨後節引材料，附加分節按語，作爲每篇主題的論證，參以對重要引語的解析。這種寫法，既給人以「言必有據」的印象，也易被熟悉《御批通鑑綱目》、清朝續《通考》之類形式的那些士大夫接受。以後他寫《孔子改制考》，採用的是同樣形式。

《新學偽經考》的旗號是伸張孔子的教義。康有爲宣稱孔子教義的中心是「改制」。爲了改制，孔子創作了「六經」——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康有爲也知道《樂》本無書，其他五經的最早傳本都出於西漢。西漢開國，上距孔子死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，中經戰國，更經秦朝焚書，除了《易》作爲占卜書得以赦免不燒外，別的四經在西漢都有不同的傳本，怎知哪些傳本是孔子手定的「真經」呢？康有爲處理的方式極其簡單，那就是將廖平的結論推到極端。

廖平雖說西漢博士官傳授的今文經傳，比劉歆傳授的古文經傳可信，還不敢說唯有今文才是孔子的真傳。康有爲則不然。他宣稱漢博士的今文經傳所以可信，因爲都傳自秦博士，而秦博士的藏書，不在秦始皇焚書的對象之內。既然秦朝保全了博士藏書，那麼漢博士傳授的當然都是足本「聖經」。凡與此不同的古文傳本，統統都是劉歆利用整理宮廷藏書的權力所造的贗品。劉歆